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上海犹太人社会 生活史

王健著



SHANGHAI
YOUTAIRENSHEHUI
SHENGHUOSHI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上海犹太人社会 生活史

王健 著



SHANGHAI
YOUTAIRENSHEHUI
SHENGHUOSHI

上海辞书出版社

教育部第五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4 年重大项目 (批准号: 04JJDZH007) 研究成果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资助项目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编纂委员会

主任

熊月之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军 马学强 宋钻友 张 剑 张晓敏
陈祖恩 金大陆 周 武 承 载
钱 杭 唐克敏 熊月之

总 序

熊月之

在古今中外城市史上,没有一个城市像近代上海那么内蕴丰富,情况复杂。这里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法租界是 115 伏,公共租界是 220 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

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中国城里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德华七世大街(今延安东路),接着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南头,然后穿过民国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可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白俄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是中国警察。^[1]

这里人口多元。域内人口八成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 18 个省区。同乡会是他们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关系,名目繁多的会馆、公所,为同乡寻

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子女就学、看病就医、办理婚丧嫁娶之事,发挥重要作用。千姿百态的地方话、地方菜、地方戏,成为各路同乡认同的重要标志。外侨人口最多时超过 15 万,所属国籍与民族最多时超过 60 个,各种总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日本人则自成社区,将虹口地区建成了“小东京”。

这里货币多元。几乎所有重要的列强都有银行在上海发行过货币,确切可计的有 18 家。它们发行的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等,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光怪陆离,莫此为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哪怕是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能够像这里有那么多品种的货币流通。

这里教育多元。除了国人官办或民办的学校之外,有教会办的,租界工部局、公董局办的,外侨团体办的,有在美国注册、用英语教学、英语考试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用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教学的,学制、教员、教科书、教学方法、毕业文凭五花八门。

这里宗教多元。门类之多,教务之盛,信徒之众,均为全国其他城市所罕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之外,还有犹太教、东正教、袄教、锡克教、理教。这些信仰系统来源各异、形成历史长短不一、信奉对象千差万别、教堂样式千姿百态、礼拜仪式形形色色、节日庆典斑驳陆离的宗教,如果散布在世界各地,每个地方都自成一一道风景线,一旦汇集到一个城市,那就是众神毕至、群仙咸集、各显神通、各呈异彩的名副其实的宗教博览会。不难想象,近百年间的上海,这里是佛教的水陆法会、春节烧香、除夕撞钟、元宵彩灯、观音诞辰、龙华庙会、浴佛盛典、盂兰盆会;那里是道教的画符念咒、掐诀步罡、祈晴祷雨、驱鬼逐妖、占卜堪舆、超度亡灵,各路神仙从元始天尊、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九天玄女、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到铁拐李、吕洞宾、关公、钟馗、春申君、黄道婆、施相公、秦裕伯、陈化成，一路走来。一会儿是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五大功修、开斋节、宰牲节；一会儿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的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感恩节、圣餐礼拜、结婚礼拜、追思礼拜、安葬礼拜；一会儿又是犹太教的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普林节、修殿节、除酵节。这边是留蓄长发、上衣至膝、戴锡佩剑的“红头阿三”锡克教徒；那边是头戴白帽、身穿白衫的“白衣秀士”祆教信徒；再那边则是壁挂葫芦椰瓢、戒烟戒酒、大摆素斋的理教信众。

人口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必然带来节假日多元、风俗多元。一些多民族人混处的机关、团体、学校，为了照顾各自的宗教信仰，放假的节日就特别多。比如，圣约翰大学就中西节日兼顾，在春节、端午、中秋节要放假，在受难节、复活节、升天节、感恩节、圣诞节也要放假。

至于语言多元、报刊多元、饮食多元、服饰多元、建筑样式多元、娱乐方式多元，早已为人们所习知，毋庸赘言。

这么多的“多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近代上海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处于多种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

这里处于中国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虽是中国土地，但受治外法权保护，中国地方政府不仅不能管辖作为上海城市主体的租界里的外国人，连对租界里的华人也没有充分的管辖权，不能随意征税，不能随意拘捕，不能随意审判。

这里也处于英、美、法等国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公共租界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权力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里，但是，它不等于香港或新加坡，工部局总董不等于香港总督。工部局总董由租界有关居民选举产生，并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也不一定总要听从英国领事的意见。法租界的情况有别于公共租界，但法租界与法

国政府的关系并不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仅出现在一个租界与华界之间,那还比较简单,而出现在两个租界并存、三个政权同在的情况下,就更为特殊,对于英、法、中等权力控制系统来说,也更为边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上海租界距离英、法、中国权力控制中心都特别遥远。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出现在政治体制相近、司法理念相近、价值观念相同的情况下,那还比较简单,其间的差异会较多地体现利益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但事实是,英华、法华之间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既大异其趣,英法之间又曾为宿敌,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整个上海便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对其作任何简单的概括、断语都是一种冒险,都可能失之偏颇。你可以说它是黑色的染缸,我可以说它是红色的摇篮;你可以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我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你可以说它摩登,我可以说它传统;你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罪恶之渊薮,我也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文明之窗口。红与黑、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世界性与地方性……几乎任何两极对立的判断,对上海来说都能成立。只有一种判断不会招致反驳,这就是:极其复杂。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这首先表现在它的文化交流功能。近代上海很像一个袖珍地球,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英、美、德、法、俄、日、犹太、印度……全中

国不同地域文化,南起香山、潮州,北到齐鲁、幽燕,东起江浙,西迄川湘,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俗,都到这里来一展风采,互相交流、融合。说它像一个袖珍地球,而不是世界文化博览会,因为很多外侨是这里的居民,而不是过客。居民与过客不同,居民有长久性,有认同感,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英美人自称 Shanghailanders,直译就是上海人,过客则呈临时性,无认同感。因为是居民,所以,他们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首先是自己欣赏,满足自用,而不是为了炫耀、兜售。其结果也有宣传作用,但这种宣传不是灌输式宣传,而是示范式宣传。灌输式宣传是我说你听,俯视式的,示范式宣传则是我做你看,平视式的,后者更能让受众心悦诚服,自觉接受。

这也表现在它的唯一性。放眼世界,盱衡古今,从古希腊到新大陆,从亚细亚到欧罗巴,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成千上万,有哪个城市会如此复杂?绝对没有。纽约、洛杉矶、巴黎等,也都是多民族移民城市,也都是多元文化,异质文化交织,但是,它们都不是行政机构多元、司法系统多元、交通系统多元、货币多元,在异质性程度方面,都远远不能与近代上海相比。

这还表现在它的不可复制性。道理很简单,那么多的多元的存在,是以中国政府丧失对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司法权、教育权等为前提的,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都不会以丧失对一部分主权来进行这种复制。

这种不可复制性还在于,它的形成过程也不可复制。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并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主观设计出来的,具有不可逆料性。治外法权是租界产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西方列强在中国共设有 26 个租界,在许多城市享有治外法权,但没有哪个租界、哪个城市出现像上海这样复杂的情况。如果没有小刀会起义、没有道台权力失控、没有华洋混处,上海租界的形态就不会是后来人

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而小刀会起义、道台权力失控、华洋混处局面出现,都是彼时彼地、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政府与人民、现实与历史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

内蕴如此丰富、情况如此复杂的城市,正是研究社会生活史的极好对象。

研究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从多时段、多角度、多侧面切入比较理想。为此,本书在卷目设计方面,既有以空间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公共活动场所(茶馆、饭店、旅社、浴室、广场、菜场)、公共娱乐场所(公园、影剧院、书场、游乐场、跑马厅、跑狗场、赌场)和校园生活的研究;也有以职业、阶层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买办、医生、报人、律师、科学技术工作者、舞女生活的研究;还有以国别、民族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英美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犹太人、印度人的研究。各卷关注点以广义的社会生活为主,包括人们的居住、饮食、衣饰、交通、娱乐、交往、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工作环境、工作特点、收入、消费等方面,兼及其政治态度、精神生活。

本书以研究近代上海为主,兼及古代、当代上海。上海城市生活,从时间上看,明显地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43年开埠以前,那时的上海是中国普通沿海城市,与宁波等一般沿海城市相比,没有太多特别之处。第二阶段,为1843年至1949年5月,即通常称为近代的时期。第三阶段,1949年5月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第四阶段,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古代上海是近代上海变迁的基础,当代上海是近代上海的延伸。1949年以后的上海城市生活,其变迁起伏,与整个中国城市生活变迁起伏的曲线基本一致,影响城市生活变迁的函数,时代因素重于区域因素,但是,上海仍然有其自身特点,有其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精神。

这是本丛书将古代、近代、当代连通起来进行研究的原因。

历史研究需要关注宏大叙事,也需要关注日常生活。如果能够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关注宏大叙事时兼及日常生活,在关注日常生活背后有宏大叙事意义,更为理想。本丛书汇集这么多学者集中研究上海城市生活,除了上面所述的学术因素,即上海城市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还有一个奢望,就是通过这项研究的展开,试图探究一下彼此悬殊的异质文化,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下,是如何相遇、共处、交流、融合的。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全人类已经面临、无数学者正在关注的重大问题。

这是因为,历史行进到信息时代,波音飞机、高速列车,极大地提升了人类个体流动的速度,手机、因特网,极大地加快了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古人所臆想的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都已成为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员交流、信息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便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理解、尊重、共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重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冲突的担忧,还不如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对话、文明和谐的冀盼。历史是现实的老师,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总爱向历史请教,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于是,异质文化解读史、异质文化交流史受到学界的空前重视。在这方面,近代上海是难得的个案。

以近代上海与今之世界相比,同构、相似之处极多。近代上海实为一小世界,今之世界实为一大上海。

本书总的框架、卷目由我设计,各卷内容则由作者独立完成,我既不参与其章节设计,也不负统稿之责。

本书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各卷作者多为上海

社会科学院专业研究人员,来自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欧亚研究所,也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与上海档案馆的学者。多年来,课题组多次举行国际、国内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对所研究对象以及中间成果进行交流、讨论,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书是课题组成员多年来集体攻关的智慧结晶。值此项目完成之际,作为项目负责人,我谨向各位课题组成员,以及他们所在的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7年12月24日

注 释

- [1] 石海山等著,朱荣发译:《挪威人在上海 15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第 70 页。

序 一

熊月之

近代上海外侨中,犹太人是相当特殊的群体,其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移入过程呈明显的阶段性。犹太人移居上海,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以前,为零星移入阶段。1900年前上海犹太人不足800人,1900—1919年约为2000多人,1934年达5000多人。这些人或来自中东,或来自俄罗斯,从总体上说规模不大。第二阶段,1938年以后,为突然增加阶段。1938年6月上海犹太人激增至1.4万人,以后继续增加,最多时近3万人。之所以有那么多犹太人集中移居上海,其直接原因就是纳粹德国加紧对德国、奥地利、波兰等国犹太人的迫害,而上海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可以不需签证允许进入居住的城市。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上海日本占领军对集中在虹口的犹太人实施新的管制。二战结束后,这批犹太人又很快分散到世界各地。上海犹太人的动向,浓缩了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

其二,侨民源于同一民族但来自不同国家。犹太人当时是有民族而无国家。上海犹太人的国籍有英国、德国、奥地利、法国、波兰、

俄国、荷兰、丹麦、土耳其、立陶宛、美国等。这些侨民，都有双重认同，既有犹太民族认同，又有所属国籍认同。这一特点对于犹太人广泛接触其他民族文化、容易理解其他民族文化、易于进行国际流动有重要影响。晚年哈同既信犹太教又信佛教，饮食中西并重，葬礼也是中犹混合，就是一个典型。

其三，灵活善变。上海犹太人见多识广，头脑灵活，在上海这个移民世界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们善于经商的才能。他们投资，有独到眼光，一要能赚钱，二要能得钱。所谓能得钱，就是善于把赚到的钱变现，带走。他们较多投资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及各种商业，较少投资工业，很少自己购地盖房置设备。这样，一旦国际形势变化，他们很容易抽走资金，另择他处。二次大战以后，沙逊集团预感未来上海形势不利于发展，乃以低价抛售很多房地产业，规避了形势变动的风险。在政治方面，他们表现得相当灵活，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周旋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这以哈同最为典型。他一方面与清廷权要结亲交好，一方面又与革命党人暗通声气；一方面向北洋官僚频送秋波，一方面与孙中山等人频繁往来。孙中山南下护法时，哈同曾一次捐赠五麻袋现钞。多方投资，风动云动哈同利益不动。

其四，成功人士众多。上海犹太人中，除了众所周知的沙逊、哈同、嘉道理等巨富外，其他在房地产、金融、保险等方面出类拔萃的也为数不少。作为在两租界政治、社会地位标志的董事人选中，犹太人中有 18 人担任过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6 位担任过法租界公董局董事。这些成功人士中，很多富有传奇性。哈同、嘉道理、马易尔、科亨、斯塔爾、布洛赫等，都是由普通职员或经理人上升到洋行老板，或者白手起家，创业成功。斯皮尔曼 1897 年来中国之初，只是银行的一个出纳员，经过勤奋努力，成为万国储蓄会总经理、法国保太保险

公司董事、中国建业地产公司董事、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也是上海法国赛狗总会和上海法商赛马会创立人之一，曾获法国政府颁发的骑士荣誉勋章。科亨从君士坦丁堡来到上海，起初生意规模很小，后来一跃成为上海黄包车之王，先后创办飞星黄包车公司，也是汽车行业大佬，其飞星汽车行拥有数千名中国雇员。

其五，奢侈消费之翘楚。近代上海，犹太人是夸富斗奇、奢侈消费的代表。上海最早拥有私人汽车的富商中，犹太人占有很大比例。1910年拍卖汽车牌照，前五个号码中，有三个为犹太人所有，即2号至4号，拥有者为沙逊、莫里斯和哈同。1号牌照为上海宁波籍房地产商周纯卿抢得，至今为上海人盛赞不衰。上海最早引入的凯迪拉克车主是犹太人，嘉道理拥有别克和劳斯莱斯，索福兄弟和埃兹拉夫夫人均驾驶豪华轿车。嘉道理的私邸，大理石宫，用料全部由意大利进口，工程总造价白银100万两，是上海第一幢装空调的私人住宅，被称为大理石宫。沙逊在西郊的私人别墅，设计之妙，环境之优，建构之精，饮誉远东。哈同所建哈同花园，被称为海上大观园，占地之广，运思之巧，景致之胜，花费之巨，为上海一大景观。

上海犹太人这些特点，多侧面地反映了近代上海城市精神，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吃苦耐劳，灵活善变，引领潮流，也生动地折射了近代上海城市的特点，诸如“冒险家的乐园”、连接中西的桥梁等。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沙逊、哈同、嘉道理等人一串串或真实、或夸张、或幽默、或传奇的故事，一部上海近代史会成什么样子！

对于上海犹太人的历史，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潘光教授率领的犹太人研究团体，无论是档案挖掘、人物访谈、论著发布还是网络建构，均属国内一流、国际知名。作为这一团体中的得力干将，王健多年沉潜于这一领域，搜罗之丰，钻研之深，思虑之密，令人钦佩。由他来撰写这部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实在是

最合适人选。本书通过大量过细的扎实资料,相当全面、生动地展示了上海犹太人的社会生活,从物质到精神、从衣食住行、社会组织到宗教风俗,较之以往的关于上海犹太人的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上都有新的进步,在这套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中也独具特色,熠熠生辉。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8年8月16日

序 二

潘 光

10年前,在《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一书的“前言”中,我曾将王健称为我们犹太研究中心涌现出来的新秀中的“佼佼者”。10年一晃过去,他已步入中年,成为犹太研究领域成果丰硕的知名学者,此次又推出力作《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令人倍感欣喜。

上海犹太社团曾是远东最大的犹太社团,拥有自己的宗教公会、犹太会堂、学校、医院、俱乐部、公墓、商会、50多种出版物,活跃的政治团体(特别是锡安主义组织)。在上海这个不存在本土反犹主义而又海纳百川的大环境中形成和发展,使上海犹太社团具有许多特色:处于安全,友好的氛围之中,与中国居民和地方当局保持着友好关系,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还互相支持;始终与整个犹太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锡安主义思想在上海迅速发展,纳粹大屠杀也对上海犹太人形成巨大威胁,二战后上海犹太人又积极支持以色列国的建立;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组织了活跃而又生气勃勃的教育、娱乐和体育活动,其中的优秀人才众多,仅著名音乐家和医学专家就有数百位。

与哈尔滨、天津犹太社团以阿什肯纳兹犹太文化为主导,而香港

犹太社团以塞法迪犹太文化为主导不同,上海犹太社团形成了塞法迪文化、俄国犹太文化、中欧犹太文化三者互相融合的社会生活体系,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海派文化互相影响和交融,在犹太民族离散史上独具一格。正因为此,这些年来关于上海犹太人的著述、研讨会、展览会、影视作品不断涌现,成为国际学术界和公众关注的一个热点。

由于受到极“左”思潮和十年文革的冲击,国内关于上海犹太人的研究是在1978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以后才起步的。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研究集中在政治、经济领域,特别是关注二战期间来沪避难的欧洲犹太难民,专门研究上海犹太人社会文化生活的著述甚少。近年来,饶立华、汤亚汀、许步曾等学人对上海犹太人的报刊、上海犹太人的音乐生活、犹太文化名人在上海等问题做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并推出了几本著作,但至今仍没有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发展史的专著。从这个角度讲,王健的《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填补了一个空白,不仅在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上海史、犹太社会文化史等研究领域,而且在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宗教学、民族学、哲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均具有学术价值。同时,在迅速发展中的上海迈步走向2010年世博会之时,该书也在发掘上海历史上的国际文化资源,研究海派文化中的外来文化要素,增强上海国际竞争力中包括文化实力在内的软实力,进一步拓展上海的对外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不同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构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本书有三个特点。一是全面,将上海犹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诸方面活动均纳入社会生活发展历程这条主线内进行综合研究,涉及了上海犹太人生活的所有方面,此前研究上海犹太人的著作还没有这么做过。二是独到,如有专章研究上海犹太人的礼